

康雍乾經營與開發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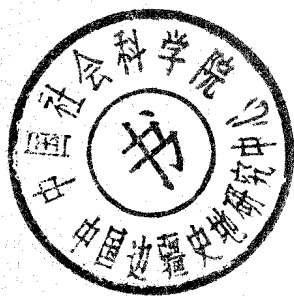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

袁森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记030号

责任编辑：陈宝良

责任校对：易小放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张汉林

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

Kang Yong Qian Jingying yu Kaifa Beijiāng

袁森坡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京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5印张 4插页 477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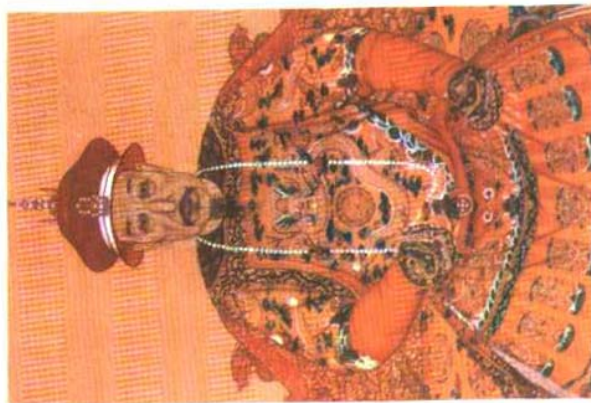
ISBN 7-5004-0759-9/K·95 定价：13.10元



康熙帝像



雍正帝像



乾隆帝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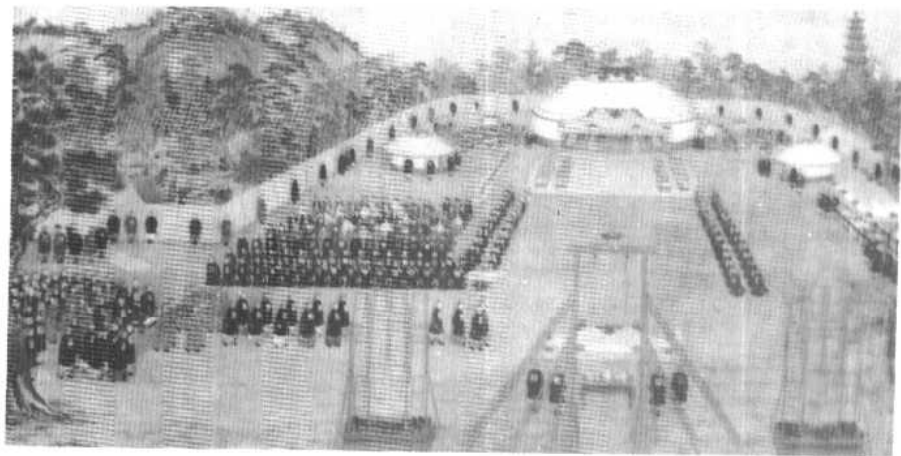
香妃像



《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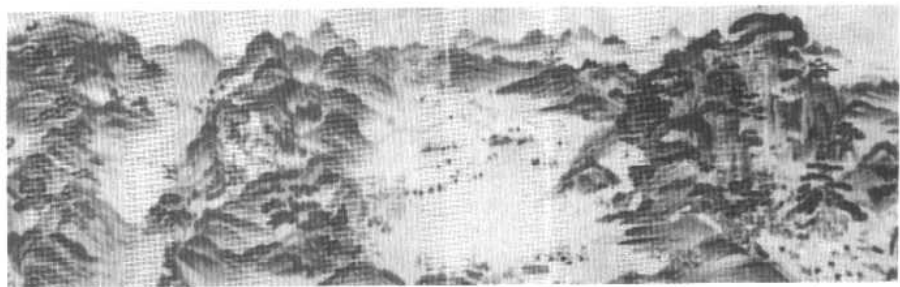
清人绘《北征督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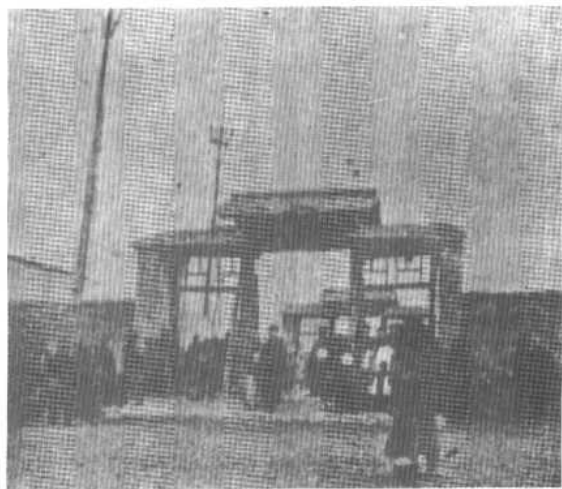
乾隆万树园赐宴图



坤輿全图



清人绘《进军西藏图》



驻藏大臣衙门



清伊犁将军府城楼(惠远城)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首先应当弄清楚什么是“边疆”。关于“边疆”一词的含义，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认为，边疆是地理概念，它与国界线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边疆”就是靠近国界的地区。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因此，历史上中国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之间又存在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周秦以来，记载疆域经略、边疆地势险夷、区划沿革、驻防兵制、政教措施、边民风情、民族政策、边臣疆吏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这反映了先人对边疆问题的重视，也为后人进行边疆史地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了近代，中国的边疆与内地一起陷入危机，使几代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警示世人，一些仁人志士、专家学者，或创辟榛莽，或继往开来，终于建立起中国边疆史地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不过，囿于时代、阶级和观念的局限，人们还未能科学地认识和说明边疆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虽有一些力作堪称珠桂，但其数寥寥，影响有限；疆域沿革与边界变迁问题又曾一度被视为研究禁区，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与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要求极不相称。

ZJ48/2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为促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本着开拓、开放的精神，承担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组织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这套丛书终于得以陆续付梓。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有助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和在全国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做出贡献。

丛书选题广泛，包括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许多重要方面，从各个角度探究边疆的各种问题。诸如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最新研究成果，都将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以往人们多注重陆疆问题而疏于海疆的研究，这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提倡在研究中陆疆海疆并重，不可偏废。

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内涵是复杂的、多重的，对它的全面认识，不可能一次成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呈现于读者眼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7月20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

丁 伟 志

吕一燃、马大正同志要我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本想敬谢不敏。冒充内行，乱写序言，是双重过错。可是又推辞不掉，因为出版这套丛书的主意最初是我提出的。这套丛书的出版我理所当然地该承担一份责任。

1985年夏，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负责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联系，当时曾和中心的负责人邓锐龄同志多次商量边疆史地中心的工作。为了改变边疆史地研究成果零星散落、发表困难、效益不著的状况，我向邓锐龄同志提出了编辑出版《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建议，得到了他无保留的赞同。此议，又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家珣同志、副总编辑余顺尧同志的全力支持。经过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们三年来的埋头苦干，提供了第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加上编辑们的努力，现在丛书终于得以付梓。

说来有趣，我和历史地理研究凑巧还有点机缘。这是童年的事了。我的父亲是顾颉刚先生主持的“禹贡学会”的会员，他常常在家里做些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童年时期，我还有幸在北京小红罗厂8号“禹贡学会”院内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时懵懂无知，但是父辈们勤奋阅读浩繁的文献典籍、一丝不苟地绘制历史地图的情景，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我觉得那的确是一桩非常庄严的事业。实在惭愧，童稚时期的这段经历，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但是这段经历却也使我对于历史

地理的研究始终抱有一种相当强烈的亲切感，并且也很容易接受阐明历史地理研究如何重要的道理。'

说这番纯然是个人色彩的话，并不是想表白自己于边疆史地研究有什么特别的发言资格，也不是想证明自己对于边疆史地研究具有特别强烈的个人兴趣，而只是想表达一下一种心情，这就是自我感觉还比较容易领会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性，因而出自内心地愿意为这项事业稍尽绵薄，为它做些推荐和鼓吹之类的事。

边疆史地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这在丛书的《出版说明》中已有充分阐述，我只想针对目前颇为流行的“历史无用论”一类的误解说点想法。现在确实有一种对历史学的误解，就是认为历史学，特别是古代史研究，对于现实的改革和建设没有什么用处；认为研究历史问题既不能解决现实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又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可见这必定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无法应用的、学究式的活动，不值得提倡和重视。难道果真如此吗？我想颇为人们视为冷僻之道的边疆史地研究，就足以证实此种见解之大谬。边疆史地研究的现实价值，通常是到了边界纠纷时才会被突然想起，其实它的价值远不止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之际；在和平建设中，这种研究又何尝没有重大价值。为了实现现代化，在我国广阔的边疆地区规划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难道不需要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帮助吗？在我们推行开放的方针、发展与周邻许多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友好往来的过程中，难道不需要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帮助吗？恐怕只能说，我们过去的眼光太短浅，看不到边疆史地研究这种“养兵千日”式的日积月累的平凡工作所具有的长远的现实价值，看不到它所蕴蓄的重要社会效益（不只是政治的、军事的，而且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效益），因而对它的重视程度极为不足。现在是到了扭转那种把历史地理研究看作无益于现实的错误观念的时候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出版，苟能有助于此，也是一大功德。

当然，对于边疆史地研究的效益，不能从狭隘短视的功利观

点上去衡量。边疆的历史地理，是历史形成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相当复杂的演变过程，因之对于它的研究不可能不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文献和档案资料浩如烟海，搜求剔取、整理爬梳之难自不待言，边疆地区的实地考察无疑更是要备尝艰辛的事，何况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还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知识为必备手段。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需铢积寸累，不能一蹴而就，“前人栽树，后人得实”的事也是常见不鲜的，况且这种研究成果往往是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和多次转化才能实现，其现实的社会价值不能不实际地要求关于边疆史地的一切研究都直接具有立杆见影的现实功能效用。因此，在充分估计边疆史地研究具有重要社会效益的同时，又要充分认识这种科学研究的性质，尊重其学术事业的特性，切不可动辄以“脱离实际”“冷僻无用”罪之。

正因为是科学事业，边疆史地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匡正旧说、提出新见的事，论断分歧、发生争议的事，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都是学术发展的契机。也正因为这样，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所表达的只能是学者们的学术见解，而不是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意愿，更不是代表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切切不可把学者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观点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分的责怪，或过度的重视。只有各界人士把学人之言作为学人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史地这个有时还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放开手脚做事，边疆史地研究这块科学园地才能真正得以垦拓，得以繁盛。

1988年8月1日于北京

序 言

吕一燃 马大正

1989年2月6日（春节正月初一），袁森坡同志由石家庄赶赴北京，送来了长达40万字的书稿《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恳切请求提出修改意见。研究中心的同志们读后，认为是一部材料充实、观点鲜明、锐意创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符合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出版要求，乃将书稿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过编辑同志辛勤劳动，书稿付梓在即，欣喜之余，愿为之序。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自秦始皇建立中央封建集权国家以来，尽管兵燹不断，战祸频仍，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却是历史发展的大潮和主流，在长达两千年的悠长岁月里，在中华大地上曾先后出现过四次大一统的局面。秦汉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盛唐时期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腹地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出现了“华戎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蔚为壮观的局面；宋、辽、金各代，汉民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共同克服了战乱造成的种种困难，发展了内地和边疆的开发与交流；蒙古族开创的元朝，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一统全国的端绪，因而使内地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包容，而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极富特色的大融合，并且一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封闭的边疆观念；清代前期，清政府在元、明两代的

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统一。自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都根据当时特定历史条件，采取了相应的边疆政策和措施，经唐、元、明、清诸强大王朝的不断修正、补充、完善，渐成体系，其完整和丰富，为他国历史上所罕见。尤应指出，清代与当代中国历史衔接最近，清朝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清朝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当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批判地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历史遗产，对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认识中国国情，增强各民族团结，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倾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历程，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这门学科的开展是与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紧密相连的。有关我国边疆史地的载籍虽然汗牛充栋，学者代不乏人，成就各有千秋，但作为一门科学，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得以形成，并出现了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是1840年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清帝国封闭的大门，一系列赔款、割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东南海疆的频频告警，东北、漠北、西北、西南陆疆的危机日益深重，使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深感国势衰微，忧患丛生，为了抵御外侮，巩固边防，他们殚精竭虑，潜心于边疆史地研究，写出了许多震聋发聩的著作。第二次是在本世纪20—40年代，一批接受了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他们痛心于敌寇侵袭，国土沦丧，组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希冀通过边疆史地的研究，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民族存亡之秋，他们是驰骋于史坛的骁将，以学术报效祖国的尖兵。现在，我们正面临的第三个研究发展时期，可以说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年来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诸学科的发展准备而出现的。气候与土壤条件与以往绝然不同，边疆史地研究沐浴着时代的春风雨露，可以断言，人才辈出、硕果纷呈的欣欣向荣局面，必将

指日可待。在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程中，我们本着“协调、服务”的初衷，将尽可能地为全国学人和广大读者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领域广阔，内容丰富，它不仅与历史学科中的中国通史、各朝代史密切关联，同时也是民族史、地方史、中外关系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要研究历代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时也要研究当地的地理、民族、宗教、习俗，以及对外关系诸多方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离不开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实际上是一门众多相关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袁森坡同志的书稿，探讨清代康雍乾三朝对北疆（东北、大漠南北、西北，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青海、西藏）的统一进程、管理政策、经济措施，及其深远影响和历史局限。毫无疑问，这些内容属于清史范畴，但由于反映的地域都在边疆，涉及到了清代治理边疆的方方面面，所以，也是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其列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出版，无疑是适宜的。

综观全书，作者写作时有几个鲜明优点，值得一提。

其一，是资料的丰富和翔实。全书的时间跨度为康、雍、乾三朝，长达一个多世纪；空间囊括了北疆和青藏；民族涉及到满、蒙、汉、维、藏、哈萨克、柯尔克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锡伯、裕固等，其中的蒙古族又分厄鲁特四部、喀尔喀三部，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及内属蒙古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两旗，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各种文字载述也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牴牾。作者为了科学地总结清朝统一北疆的这份丰厚历史遗产，在资料的收集、鉴别、归纳、考订、利用上，下了扎实的工夫。首先，作者认真攻读了有关的汉文史籍、方志、档案、著述、笔记，这些史料卷帙浩繁，仅康雍乾三朝实录即多达1959卷，《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还不包括在内；其次，作者利用了我国翻译界和民族史家的成果，尽可能地读了俄、日、英、法、

意、德等文种的译著，以及满、蒙、托忒、维、藏等我国民族文字的译著；第三，作者也汲取了近年来学术界有关的研究成果。从书中的“呼应注”看来，作者引用的书目近300种。此书之所以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与作者“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勤学态度，“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沈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推敲精神，有直接的关系。

其二，作者注重实地考察，核对史实。我国边塞疆域辽阔，从东北到西北，纵横几达万里。关于边疆的一些问题，清代学者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但由于当时关山阻隔，信息不灵，所以也难免有失实或过于简略之处。为搞清问题，作者继承我国史学登山临水、访古诹今的优秀传统，足迹遍及长城沿线的九边塞外，以及东北、青海等地，从而获得了大量生动的历史地理、民族、文物、考古、宗教、边城等方面的知识，从而纠正了史籍中某些谬误，并增强了论述的形象性和准确性。诸如，乌兰布通古战场的位置和地形，木兰围场的范围和生态环境，口外行宫的分布及规模，清代塞上牧场的变迁，多伦诺尔的兴衰，许多边塞城镇的发展状况，清代驿道的一些站点，都是通过实地访问、验证而弄清了来龙去脉。如果完全囿于书本知识，或冥思苦索，闭门臆测，论述时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三，勤于练笔，反复修改。这部书稿的论纲，在1979年即已拟出，1983年发表了一部分，即《康熙的北部边防政策与措施》，在学术界反响良好。此后，作者抖擞精神，四易其稿，终至成书。在这个“由博而约”的过程中，作者遵循先贤“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惰”的古训，旁搜博采，融会贯通，提炼思想，以简驭繁。应该说，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

目前，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已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正在制定规划，组织队伍。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很多，诸如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开发的研究，边界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对历代学者成果的评介和研究，各民族文字

史册的整理和校注，对海外著述的翻译与研究，资料库与信息网络的建立，新生力量的培养，都亟宜加速进行。但是，与其他已有长足发展的学科相比，目前边疆史地研究者的队伍还不大，起步较迟，由于历史的原因，学者本身的知识结构也有欠缺和不足，真是任重道远，征途多艰。我们深知一代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蕴藏着极大的研究潜能，他们精力充沛，血气方刚，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只要合理加以扶植、鼓励、资助，他们就会在边疆史地研究的广阔领域里迅速作出成绩，大显身手。现在我们这套丛书出版的著作虽只有几部，但数茎泛绿，预示着春华灼灼，疏星闪烁，预示着河汉灿烂，只要有志者勤奋笔耕、不懈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里姹紫嫣红、万卉齐发的艳丽图景，是可以在预期内提前实现的。我们衷心地希望广大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一洗征尘，投身于这一有裨于民族团结、边防巩固、边疆开发的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

1989年11月于北京